

拆他人信件，侵犯公民通信自由權利，情節嚴重的，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由此，才真正將保護通信秘密列入法律保護範圍。在中國 20 世紀 50 年代到 70 年代末，一些特定公民，比如四類分子、右派、專政對象以及一些被懷疑的人，其通信權利是受到限制的。他們的信件並不是由公安局等國家正式授權機關實行開拆的，而是由農村大隊幹部、工廠領導以及治保人員隨意開拆、檢查的。

特別是 1954 年的胡風事件之後，人們在寫信時還要擔心自己的書信會不會被收信者公開或上交。1954 年 5 月胡風在呈送中央的《關於舒蕪》的材料中不當提級和摘引舒蕪給他的私人書信。而 1955 年 5 月，舒蕪應《人民日報》約稿，撰写的《關於胡風的宗派主義》中也大量引用胡風的書信，後來將這些私人書信進行摘錄、分類、注釋，形成了所謂《關於胡風反黨集團的一些材料》而加以公布，首開了公開和利用個人書信進行政治鬥爭的惡例。從此，許多知識分子之間在書寫私人信件時都時刻擔心自己的信會不會被公開或上交，因而可能不敢寫真話。其實，在中國早在 1930 年代，魯迅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和《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中就未經對方同意而引用對方信件。這種做法，在中國一時是並不為奇的，通信秘密受法律保護的觀念淡薄。

在地方村落文獻中，比如有人看到四清工作隊的會議記錄。工作隊主要研究討論他們上報的文件如何要按照上級的精神寫出來，能得到上級的認可和通過，而不是按照村里的實際情況上報，這樣寫出的工作報告，雖然產生在基層，但是，其內容並不是農村真實情況的反映，而是按照上級的意思來寫。所以其可靠性就有問題。村落資料中還有很多農民寫的申請書、檢討書和決心書一類的，是農民寫的，但很多是套用報紙文件的說法，比如剝削階級思想、資產階級法權、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等，對此農民真正了解多少也要考慮。這種文件數量很大，但是內容基本雷同，大多抄自報刊文件。

最後，使用個人和地方文獻也要注意個人隱私的問題，這涉及到學術倫理問題。農村文獻中許多檢討書、揭發信中涉及個人的婚姻、男女關係和個人品質問題。這些人或他們的後代還活著，有的還生活在村里，引用和公開這些資料時就應特別注意。

第三部〈從檔案資料考察“中國”的內與外〉

深化「胡適研究」的新工具——「胡適檔案檢索系統」與「胡適藏書檢索資料庫」簡介

潘光哲（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

在廿世紀的華人歷史舞台上，胡適始終占據樞紐的位置，沒有人能忽略他的存在。胡適信守堅持的理念，胡適努力以赴的事業，究竟具有什麼樣的啟發意義，用胡適自己的話來說，當然需要「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的努力。然而，胡適獨特的生命旅程與思想世界，錯綜複雜，盡量避免將複雜的歷史圖像「簡單化」、「標籤化」的危險，我們對胡適的生命道路及其思想遺產的認識，方始更形精緻。不過，比較完整與便於利用的《胡適全集》，至今猶未問世；胡適與友朋之往來書信與其藏書的整理，也仍是未竟之業。因此，只有廣輯博收和胡適相關的材料，才是深化「胡適研究」的正嚮要道。

位於台北市南港區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紀念館（以下簡稱胡適紀念館），初建於 1962 年，迭經興革，向來就是海內外紀念與研究胡適的最重要殿堂；推動「胡適研究」，更是不遺餘力。

胡適紀念館以館藏胡適晚年時期（主要是 1949 年以後）的原始檔案資料為基礎，借助現代科技之助力，與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學圖書館合作，將分散於兩岸的胡適檔案與胡適藏書，完成合璧與



電子化的工作。截至 2016 年 7 月，已經出版《胡適藏書目錄》(2013 年出版)，並完成(以 1949 年以後為主的)「胡適藏書檢索資料庫」與「胡適檔案檢索資料庫」【網址皆為：<http://www.mh.sinica.edu.tw/koteki/metadata.aspx>】，已向全世界公開開放，研究者不必親臨現場，只需經過簡單的申請手續，即可利用電腦與網際網路進行查詢檢索，非常方便地找到與研究相關的原始資料，並免費瀏覽列印(列印分量稍有限制)。

「胡適檔案檢索資料庫」與「胡適藏書檢索資料庫」，是開展「胡適研究」的新工具，提供助力無限。本報告以具體例證，就胡適與魯迅、錢穆、殷海光、蔣介石之間的交往和論爭等等關係，進行示範，顯示如何利用這個新工具來深化「胡適研究」，從而得到更深切的歷史認知。所以，「胡適檔案檢索系統」與「胡適藏書檢索資料庫」的公佈問世，對「胡適研究」園地之拓展，為「胡適研究」領域之深化，必然具有「功不唐捐」的作用和意義。

檔案資料的內與外——以“五四”、“香港”為中心的探討

陳學然(香港城市大學)

本報告主要結合筆者近數年有關「香港」與「五四運動」的研究成果，探討當中如何透過利用檔案資料或檔案以外的中文文獻群新資料(諸如日記、回憶錄、報刊、書信等等)，獲得了什麼樣的學術收穫；並嘗試闡述檔案資料的充分利用，從自身的研究角度出發，談談它們會給今後的當代中國研究——特別是香港為中心、為視角的中國研究帶來什麼樣的變化問題。

本報告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各行其是：「東南互保」與「兩廣獨立」中之各方政治籌謀〉為中心，介紹英國 FO、CO 檔案及以外的書信資料，如何就相關研究領域發揮補正作用。透過本文的介紹，將可以看到這兩組檔案是如何補充了目前學界相關研究的一些局限，也把圍繞着早期香港歷史發展的一些鮮為人知的要聞秘辛、反映各方波譎雲詭政治角逐的歷史線索勾勒出來。所得之成果不但可以看到 1900 年革命派、維新派、英國倫敦內閣、在港英官以及滿清政府、在地督撫的政治籌謀，同時也可以看到香港這塊小地方在各派各行其是的爭鬥中所發揮的戰略位置。FO、CO 檔案在這裏提供了很實在的參考價值，反映港英政府在受到內地政情衝擊時，到底作出了怎樣的反應以及如何着手處理內部與外部對港府的不同衝擊的不同手法。

第二部分則以《五四在香港：殖民情境、民族主義及本土意識》一書為中心，嘗試闡明「五四在香港」的知識生產乃基於九七回歸的政治因素下形成的一套源於大國史觀下的「中心」審視「邊緣」的一套論述。藉着相關研究，我們感受到中國國內的任何變動均嚴重影響香港的政局發展，儘管有些是即刻引起社會迴響的，有些是因應港府的嚴厲控制引而未發，但都不難讓人看到香港在接受內地政治餘波衝擊之餘，實際上也是國內文化正統自中心向外不斷擴散的在地延續，甚至是延續着國內左右分裂的政治鬥爭的意識型態戰場。

此外，本報告也希望說明在擺脫「五四在香港」的成說之餘，透過歷史檔案、回憶錄、日記、報紙和書信等等重新闡明「五四在香港」的知識發展，希望能夠提供多一些視角來觀察香港社會國家認同的演變史，同時更深入和全面地展示香港的都市功能與思想戰略位置。相關探討，將讓我們在大歷史的研究中發掘出更多的地方史的個體活力，顯示地方史的獨特性與複雜性，並由此而釐清一個相對地接近「真實」的歷史發展脈絡，補正大國史觀存在的一些缺失。

展望未來，上述研究將為我們下一步深入研究香港這個地方的「殖民性」的形成提供學術研究基礎。

